

“后真相”语境下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及应对

顾超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后真相”是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具有普遍性的症状,“后真相”反映的情感先于事实、质疑多于共识以及网络社会的技术手段等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土壤。“后真相”语境下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表现为利用争议事件,占据议题焦点,强化主观判断,否定历史事实,形成群体情绪,驱动舆论传播,善于巧立名目,回应主流批判,形成舆论合力,影响政权稳定的方式。应当从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强化事实与真相的权威,以客观性遏制“坏的主观性”,有效治理新兴媒介,牢牢掌握网络社会舆论引领力这3个角度予以应对。

[关键词] 后真相 历史虚无主义 舆论传播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707(2019)1-0087-05

近年来,国际形势风云诡谲,“黑天鹅”事件频繁发生,从英国脱欧公投到美国特朗普入主白宫,再到朝韩关系从战争边缘反转至双方元首的热情会晤,各种与传统相悖、与事实相左、“网红式”政治屡见不鲜,虚无主义、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浪潮正在席卷着欧美国家乃至全球。“后真相”(post-truth)这一术语正是在此背景下跃然而出,成为理解和勾勒西方政治的新词汇和新表征。“后真相”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性现象,从“后真相”的语境下来审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当今中国的传播,俨然具有“重整旗鼓”“顺势而为”的态势。因此,必须从理论上认真审视当前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时代语境,从实践中深刻分析当前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具体方式,从而进行有效地应对,旗帜鲜明地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一、“后真相”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现实语境

历史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具体

表现,是一种非理性的社会思潮和思想倾向,否定历史的价值,歪曲历史的真相。^{[1]69}当前“后真相”语境下所反映的情感先于事实、质疑多于共识以及网络社会的技术条件,既是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现实环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

(一)个体感受:情感先于事实

从本体论层面而言,关于一个事物或者事件的真相并不会直接向人们敞开,不可避免地依托于一定的程序、经过一定的处理而被再现出来。近代启蒙以来,人们获得或者逼近真相的途径大致有两个,一是依靠理性推理,二是依赖数据分析^[2]。理性推理即从一个假设的前提出发,通过逻辑推演,进而得出的一系列结论。但是,这种凭借演绎推理而得出的因果关系在洛克、休谟那里遭到了质疑,事实上,在启蒙理性不断祛魅的当今社会,人们也很难找到一个绝对真理并以此作为逻辑推演的起点。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兴起,相对于演绎推理,人们更加确信归纳性的科学数据是接近事物真相以及获得客观性的基础。但是,不论是英国脱

本文为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项目“新时代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8LZUJB-WZD006)、重点研究基地团队建设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舆情与对策研究中心”(项目编号:18LZUJBWZD10)阶段成果

欧公投还是最近一次的美国大选,其结果都与各大机构提供的数据与结论相左。数据分析仿佛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以往的魔力,数据作为真相合法性基础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伴随着这两大途径的相继崩塌,人们不得不诉诸于主观性的原则,不再关心事实上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而是关注以主观情感介入之后的后真相,试图用某种主观性的集合来替代真正的客观性。对于历史的真相而言则显得更为复杂,历史叙事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立场和主观情感,不论是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事件,还是历史经历者的个人记忆,都面临着一个普遍性问题,即对“过去”的认知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主观的“记忆”,又在多大程度上是贴近历史的“事实”,而这一问题在“后真相”的语境下被放大了。

(二) 社会舆论:质疑多于共识

社会舆论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形式,是相当数量的公民对某一问题的共同倾向性看法或意见,往往反映着一定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诉求。因而,社会舆论本身带有一定的立场与视角,尼采在其遗稿《札记》中提出了著名断言:没有事实,只有阐释。这种“视角主义”观点的启发在于,真相的客观性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视角,对于事物或某个事件共同的视角和阐释,是形成共识、产生社会舆论的前提和基础。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大大加深了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程度,代表着不同民族、职业、性别、阶级的人们表达着各自的诉求,旧的需求还没得到满足,新的需求已经产生。同时每一个个体又都是一种叠加状态的复杂主体,隶属于不同类别的共同体之中,因而社会舆论也呈现出深刻的叠加性、突发性、易变性。每一种社会舆论都自诩真相、真理的化身,怀疑、排斥、否定其他社会舆论与共识。一切的变动与不安定、普遍的质疑与批判是“后真相”语境下社会舆论的基本特征。与社会舆论一样,当历史叙事、历史书写进入到社会公共领域之后,也遭遇到了不确定、难共识的境遇,特别是当普通公众利用大众媒介参与到历史问题中,使得原本容易碎片化的历史研究进一步复杂化。

(三) 技术条件:网络社会兴盛

不论是个体将真相诉诸于情感,还是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倘若没有网络社会兴起所产生的

巨大传播力和影响力,都不足以汇聚成一种“后真相”的语境。网络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自媒体的日益兴起,打破了传统信息传播的基本格局,社会精英、主流媒体乃至政府部门垄断和监管信息传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人们可以就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不论他是否了解真相、是否掌握了真相。同时,辨别真假的责任也落到了每一个人头上,每个人都成为了新闻的编辑人、把关人和聚合器。这是网络社会赋予每一位网民的权利,但是,过量的信息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不一致和矛盾,面对充满倾向性的报道和舆论,在没有权威把关人的前提下,“谁的嗓门大,谁的声音甜美,谁就可以获胜,首先被牺牲的是真相”^[348]。网络社会中的真相更容易湮没于无限扩展和增值的表现性话语之中。此外,当前的网络社交平台在“需求——供给”的理念下,依据个人的浏览偏好,自动推送相关的信息和内容,由此产生了“信息茧房”和“回音室”(echo chamber)效应,大量同质化的信息推送都倾向于固化人们既有的认知和偏见,从而加剧了不同群体的立场和视角的分化。而历史虚无主义者正是利用了互联网传播的手段以及网上阅读的习惯,抓住热点、争议性历史话题,“戏说”“歪说”历史,名义上将历史评判交给大众,实则使其陷入“等待戈多”和超“虚拟现实”的逻辑陷阱中^[4],进而达到虚无的目的。

二、“后真相”语境下历史虚无主义传播

习近平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5]在“后真相”语境中深入分析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策略,既有利于深化对历史虚无主义本质的认识,又能掌握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基本方式,进而有效应对。

(一) 利用争议事件,占据议题焦点

在“后真相”的语境中,大众媒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关注点以及社会舆论的走向,西方传媒议程设置的鼻祖伯纳德·科恩指出,在大多数时间内媒介并不能告诉人们对事件的看法(what to think),但却能成功地告诉读者该认真考虑什么(what to think about)。而

利用大众媒介,主动地选择热门、有争议的事件进行议程设置,是历史虚无主义传播惯用的伎俩。一方面,在关键时间节点上下功夫,例如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网络上出现“八路根本没有抗日”“国民党抗战功劳最大,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等言论,引导舆论的走向,有意美化国民党,搞历史翻案,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有争议事件上做文章,例如借助纠正“文革”错误的机会,找寻“文革伤痕”,追问“是谁种下的祸根”,将矛头直指党的领袖。同时,将对“文革”的否定扩展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以及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将“纠左”与“纠社会主义”画上等号。特别要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4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上,必须时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者利用这些时间节点和事件进行发酵,切实做好回应和批判。

(二)强化主观判断,否定历史事实

“在形塑公共舆论上,诉诸情感(emotion)和个人理念(personal belief)可能比客观事实更加有效,这正是‘后真相’一词希望传达的特征和情绪。”^[6]公共舆论本身应该包含某种客观性以及正义性原则,但“后真相”语境下“坏的主观性”(黑格尔术语)无限地扩张,使得真相让位于情感,公共舆论中谬误的成分大大增加。历史虚无主义者很好地利用了这一语境,一改以往的长篇大论、系统化论述,将其注意力放在了能够为大众所感知的日常生活之中。2017年,历史虚无主义者炮制了《请刘胡兰离我的孩子远点》一文,借助普通家长的口吻,控诉了孩子在学习刘胡兰过程中“种下的血腥、残忍和仇恨种子”,短短几百字的短文在互联网中迅速传播,有部分家长感同身受,要求像刘胡兰这样的革命英雄走出历史教材,产生了极为不良的社会影响。并且,历史虚无主义将影响的重点对象聚焦在“三观”处于形塑阶段的青年,强化青年群体的主观感受,利用部分青年人想要“一夜爆红”的心理,进而达到虚无历史的目的。2018年的多起“精日”事件以及涌现出一批青年“精日分子”的背后都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子。青年的信仰关乎国家的未来,要十分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在

青年群体中传播,以历史教育来抵制“历史渐忘”,以历史事实来回击“主观感受”。

(三)形成群体情绪,驱动舆论传播

当个体观点、意见通过大众传播的渠道,特别是在意见领袖的引导之下,极易产生某种群体意识和群体情绪。这种群体意识不仅仅是个体意识的简单集合,更是对个体意识的放大和极化,“群体表现出来的情感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是极为简单和夸张……即不管什么感情,一旦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而非常快速的传播,它所明确赞扬的目标就会力量大增”“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7]33}。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互联网上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论战暗流涌动,争锋相对,既有用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成就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又有“网络大V”发表“如果1978年不改市场经济,今天中国的经济会更好”“我们实现的现代化就是美国的现代化”等言论。不论哪种观点,其背后都有意见领袖、“网络大V”进行引导,并且利用了特定群体的感受,否定改革开放后40年的人利用当前的社会矛盾、贫富差距,抓住当下的弱势群体在改革开放中没有富起来的群体大作文章,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的人则抓住了经历“文革浩劫”、部分知青的仇恨心理。关于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问题,要牢记习近平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予以坚决回击,遏制不良舆论的扩散。

(四)善于巧立名目,回应主流批判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一直是一股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其作用时间之长、影响群体之众远胜其他社会思潮,其中自有其理论上的伪装性、迷惑性,也有其形式上多变性和灵活性,还有互联网的隐蔽性、匿名性为其提供条件。历史虚无主义善于巧立名目来回应批判,主要通过以下3种表现形式:第一,依托学术研究,以“反思现有历史”“还原真实历史”的名义,达到虚无历史的目的。历史虚无主义借了解构主义的内核,反对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官方叙事”与“宏大叙事”、否定“历史的连续性”,强调“去中心”“多视角”“碎片化”的研究理念,其实质是否定现有历史。第二,文艺创作上的“去意识形态化”,文艺作品中的“戏说”“歪说”历史。有些文艺作品中以还

原历史真实人物出发,秉承“好人不全好”“坏人不会全坏”的理念,逆向重塑,有意美化诸如慈禧、李鸿章等历史人物,混淆历史认知,有些文艺作品将一些革命经典庸俗化、低俗化,戏说人民英雄,其目的是消解在长期革命中形成的理想性和崇高性。第三,与其他社会思潮“联姻”,壮大其声势。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面临着多种社会思潮的涌动,在本质上都处于唯心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形成了天然的同盟,虽作用领域不同,但彼此团结、相互策应,力图在与主流观点的论战中占得先机,并扩大影响。

(五)形成舆论合力 影响政权稳定

英国学者P.戈尔丁的传播效果分类(如图1),为我们从更长远角度来看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及其目的提供了理论的分析视角。如果说从短期来看,历史虚无主义是利用有争议的事件,引起“个人的自发反应”,渲染群体情绪,引起“集体的自发反应”,通过“巧立名目”进行“社会控制”,那么从长期来看,历史虚无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进行社会变革。毛泽东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的。”^{[9]194}从国际比较的维度来看,苏联的解体固然有多重因素,但在各个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斯大林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否定与偏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以及最终叶利钦退出苏共演说,到处弥漫着历史虚无主义,最终苏联共产党轰然倒下,世界第二强国一夜之间分崩离析,不得不说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一手妙招”。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要十分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与国际反华势力相勾结,在社会舆论中形成某种合力,威胁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定。



图1 传播效果的类型^{[8]173}

三、“后真相”语境下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应对策略

(一)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习近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制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10]不论是“后真相”的症候,还是历史虚无主义,亦或是两者的共谋,究其本质而言,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唯心史观的立场之上,因而必须用科学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予以坚决的回应。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并强调只有从现实的人的能动的的生活过程出发,“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1]152、153}“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12]50}。从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出发、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树立整体性的思维,抛弃孤立的、片面的、抽象的人性论,多方取证、探寻关联,应当是研究历史问题最基本的出发点。同时,在现实中,要进一步加强历史虚无主义的研判与回击,认真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时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在各种形式下的“改头换面”。

(二)强化事实与真相的权威,以客观性遏制“坏的主观性”

尼采的“上帝死了”标志着欧洲虚无主义的降临,也标志着“坏的主观性”的全面扩张,表征着真相、现实、实体的客观性全面溃败,这既是现代性发展到特定阶段产物^[13],也是当前中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境遇,因而必须重塑事实与真相的权威,坚守普遍的公知与基本原则。习近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就是事实,公理就是公理。在事实和公理面前,一切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的言行都是徒劳的。黑的就是黑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白

的;白的就是白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黑的。一切颠倒黑白的做法,最后都只能是自欺欺人。”^[14]同时,要以客观性遏制“坏的主观性”的张扬,在发展过程中,要用客观的事实来回应主观感受。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现实性上来讲,事实是第一位的、感觉是第二位的,人民群众只有获得了、安全了、幸福了,才会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只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坚定不移地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人民群众就会感受到,而历史虚无主义利用主观感受、群体情绪来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论与企图也就不攻自破了。

(三)有效治理新兴媒介,牢牢掌握网络社会舆论引领力

不论是“后真相”的兴起,还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重整旗鼓”,都与社交媒介领域的“失范”“失真”“失管”密不可分,因而必须对新兴媒介进行有效治理,牢牢掌握网络社会舆论引领力。第一,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主流价值观念的引领。充分利用主流话语平台和主流媒体在传播正能量、回击社会思潮、正向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第二,要建立社交媒介的信息净化机制。社交媒介可以依靠平台附着、粘合等新兴技术手段,同时利用议程设置等传统功能,对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代表的错误思潮、负面情绪进行有效地管理,及时监测舆情走势,防范把病毒式传播的危害。第三,加强网络的法治化建设。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在网络上传播历史谣言、诋毁革命人物和红色经典、践踏国旗和国歌等行为,必须予以澄清并依法处置。同时,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前提之下,进一步落实网络实名制和“信息信用制”,让“后真相政客们”“历史虚无主义者”无所遁形。第四,要培养公民基本的网络道德素养和历史素养。在互联网上进一步探索党史国史教育的新形式、新渠道,将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逐渐培养政治立场坚定、有主见、有责任、有素养的新网民。

参考文献:

[1] 历史虚无主义课题组. 怎样才能做到历史清醒[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7.

- [2] 蓝江.后真相时代意味着客观性的终结吗[J].探索与争鸣,2017(4).
- [3] [美]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M].陆佳怡,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 [4] 胡中月.历史虚无主义的四重逻辑陷阱及其克服[J].思想教育研究,2018(1).
- [5] 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J].中共党史研究,2010(8).
- [6] Midgley,N.(2016).Word of the Year 2016 is...Retrieved from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word-of-the-year/word-of-the-2016>.
- [7]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 [8]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献(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10]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09.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2] [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于光远,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3] 吴晓明.后真相与民粹主义:“坏的主观性”之必然结果[J].探索与争鸣,2017(4).
- [14]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04.

[责任编辑 李紫娟]